



博士论丛

清末国民意识与 参政意识研究

梁景和著

A STUDY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S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QING

湖南教育出版社

PDG

内 容 提 要

清末，先进分子设计了塑造新国民的救国方案。把具有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冒险、进取、合群、公德等近代意识的新国人视为中华民族摆脱国亡种灭之希望。清末有识者开始走向艰难的塑造新国民的步履之途。他们通过兴办学校、创办报刊进行国民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并利用多种艺术形式来开启民众的国民意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参政意识是国民意识的一项重要内容，国民是否具有参政意识是国家能否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因素之一。清末国民意识的觉醒促使国人参政意识之生成，而地方自治的实践，咨议局、资政院的建立以及国会请愿的群众性运动既是国民参政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又进一步提高和发展了国民的参政意识，从而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国人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发展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的产生与发展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并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

梁景和，1956年生。曾为插队知青、民办教师、中学教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师于龚书铎先生、李侃先生、林增平先生、耿云志先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和清末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著有《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一书。现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A Study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s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Qing (abstract)

Advanced Chinese design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programme for creating new nationals with a view to national salvation. They placed their hopes for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from utter elimination 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kind of Chinese nationals with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of rights, duty, responsibility, freedom, equality, independence, self-respect, self-confidence, autonomy, esteem for martial qualities, adventurousness, enterprise, gregariousness, public-spirit, etc. Along this torturous road for creating the new nationals, these people of broad vision set up schools, published newspapers, and made use of various artistic media to propagate the nationals' consciousness. The results were remarkable.

The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nationals' consciousness. Whether or not the nationals of a nation possess such a consciousness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a nation is in a position to practice democracy. The awakening of the nationals' consciousnes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Qing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at time, the practice of local autonom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ultation Bureaus and State Council for

Political Consultation, and the movement of petition to the Congress served both as marks of and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al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in China.

Handicapped by the then conditions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y,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national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s' consciousness and tha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as limited. However, developments in these two fields did leave us with a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rom which much can be learned; they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自序

本书是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

1994 年秋，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我的导师耿云志先生建议我从中国近现代国民参政意识的视角来作博士后研究报告。最后我确定了《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这一选题。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吸取了半个世纪以来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开始了思维方式的新变化，把对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向对社会主体的探讨，把救国与国人是否具备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构成清末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国民”作为近代名词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臣民、庶民、黎民相对应。戊戌时期，康有为最早提出“国民”一词，始播国民意识的火种，从此渐次形成近代的国民思潮。国民思潮所标识的主要内容在于：西方因“国中有国民而无臣民，有主人而无奴隶”而强盛，中国衰败并受列强的欺侮是“以我无国民故也”，所以欲救国，必先造就其国民。而国民与奴隶正相对立，奴隶者即“天使我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也”，“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奴隶与国民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无独立意识和自由平等权利思想。奴隶的突出表现为对身家之外的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尤其对于国家政治大事，更为冷淡，超然物外，所谓“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军国要事，“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把联系着家家、人人的国家命运完全

推给当权者去主宰，心甘情愿地听凭支配。而要具备国民意识就要彻底抛弃奴隶意识。国民意识的思想核心又体现于参政意识，即借助于政治手段与政治形式来参与国事，参与对国家命运和国人命运的主宰。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都积极主动地倡导国民意识，他们利用创办报刊、组织社团、兴办教育、文艺宣传等方式传布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并以身示范，作出表率。正是由于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促导作用，特别是这种思想意识被一部分知识分子、留学生及绅商阶层所认同，生成一股物质力量，成为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缘由；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还未泛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未能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亦成为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一个至关要素。“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靠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己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近代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是近代思想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

探究历史也是为当今的社会实践提供某些理论和经验。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旧交替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与人的政治素质紧密相连。而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又是构成人的政治素质的重要因素。那么，通过对近代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的研究，从中汲取滋养，无疑对今天在提高政治素质过程中更有效地破除国人因循怠惰、保守僵化、冷漠自私、麻木不仁、见利忘义、盲目排外或崇洋媚外、奴隶根性、苟且畏葸、权威至上、尊卑不平、欺小凌弱、依傍萎顿以及更好地养成国人独立自主、平等自由、民主法制、权利义务、自重自立、自信自尊、公德思想、合群意识、尚武进取、爱国主义等思想特征，必将大有裨益。

本书探讨了“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在清末的产生、发展及其两者的逻辑联系；“国民意识”的启蒙运动和“参政意识”的实践活动使国人在哪些阶层，在何等程度上接受和认同了这种

意识，并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哪些推动力；从“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的新层面审视清王朝覆亡的原因等。

本书研究了阶层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融合是“国民意识”、“参政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基层绅士与上层知识分子参政意识与参政方式的各自特色；综合比较立宪派、清政府两者在立宪运动中思想动机和行动方式的异同等。

本书仅是对清末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的初步探讨，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本书出版后，希望读者对本书的错误进行批评。

葛文波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1998年3月5日于首都师范大学

目 录

一、清末国民意识的产生	(1)
二、清末国民性批判	(44)
三、国民意识的文化启蒙	(67)
四、参政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125)
五、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践	(156)
六、咨议局、资政院与国会大请愿	(196)
七、清廷与立宪派“宪政”态度之比较	(242)
八、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发展的历史局限	(262)
 附录：主要参考、引征书目	 (277)
人名索引	(285)

一、清末国民意识的产生

一进入近代，中国便出现了颓势。而到清末十数年间，已经濒临国亡种灭的境地。救亡图存也就成为清末振兴国势的最强音：

“揽中国之大势，十年之中，世变亦亟矣。甲午以后，欲雪割地赔款之耻，于时人人言自强；庚子以后，欲弥赔款失权之憾，于时人人言自立；至于癸卯以来，日俄开衅，战事延长，穷其结果，国患方迫，于是忧时之士，人人则言自存。十年之内，国势三变，故其士夫论议，即各因其时会之缓急以为轻重。三者之持论，虽有不同，要其救国之心，未始或异。盖必自存而后能自强、能自立。未有不能争自存而可强可立者也，天演家物竞争存之旨莫要于存其所最宜。”^①

从甲午言自强，到庚子言自立，再到癸卯言自存，已映衬出时人对国势濒危的强烈的内心感受。而我们又可以体察到这种感受的细微之处，即时人忧患意识的步步深化。言自强，国人还敢于与外敌比较，在比较中，国人发现的只是各自的强弱不同而已；言自立，国人已经暂时放弃与外敌的争胜，只能注意自身是否还能站立起来，不能站立，与他人争胜也就无从谈起；言自存，已把意愿被迫降至最低点，只求最低限度的生存欲望，对于其它，早已无力顾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到了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若非全力寻求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国之衰运将无法

^① 《自存篇》，《东方杂志》第2卷第5期。

拯救。

国人忧患于自己国家与种族能否“自存”，乃至接受“癸卯以来，日俄开衅”的深刻影响。而日本战胜俄国，则使国人心灵深层受到强烈地震撼。中日为邻，彼此相较，别于天渊：

“今日人战胜，日人之强也。同洲感情，不能不动。然而日人荣，中国辱；日人贺，中国惨；日人喜，中国惧。日人无战不利，其荣也可知，而中国则屡战失败，疲敝不能自振，与日本相比，则辱甚。日人得偿夙愿，其贺也可知，而中国则受人约束，举动不能自由，与日本相比，则惨甚。日人大功告成，其喜也可知，而中国与强国为邻，势成偏重，一或不慎，事不可量，以国家大计论，中国其能不惧也乎。”^①

与强国日本为邻，中国的危机就更加显现出来。大凡两国相邻，只有彼此权势相伴，力量相平，地位相等，才能相互牵制，两无损害。而两国间在权势、力量和地位上存有差异，则必起冲突，导致强胜弱败。当时国人认为“以中国今日之权势气力地位而论，其价值实与日本不相侔不相平不相等，中国人若有保全国粹之心，能勿惧乎。”^②然而，任何事物都具备双向的发展趋势，与强邻为伴，亦是如此。这在当时的国人当中也有深刻的认识：

“自古立国，惧邻之强而能谋自立之策者，则国不为邻所并。惧邻之强而专存倚赖之性者，则国必为邻所吞。……故弱国与强国为邻，能强则强邻不为国之害，转为国之利，不能自强，而专以倚赖强国为苟全之秘策，今日保护之恩主，安知异日不为倾覆之仇敌乎。……强在我者可恃，强在人者不可恃。……日本与我为邻，日本既强矣，我不能不自强以并驾，我更不能不自强以图存。见日本之强，能事事耻其不如日本，则能强。见日本之强，至事事欲乞庇于日本，则不能强。不惟不能强，窃恐邻厚君薄，中国误于倚赖，终无自强

^{①②} 《论自强图存》，《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

之一日，此则大可畏者也。然则中国今日当谋自强，不必忌日本之强，亦不必畏日本之强，朝夕发愤，以期与日本并立于亚洲，力保亚洲平和之局可也。当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中国之国民，其甘列于亚洲域内入天演淘汰之数耶。呜呼，可以兴矣。”^①

在外敌虎视鹰瞵图谋吞并中国并使中国陷入空前的危机之际，此时若乞庇倚赖他人，必亡；若能发愤进取，可兴。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并没有绝望而堕落，却仍旧保持着一份自信。

中国人的自信主要表现在对自己国家的两个判断上：其一认为中国有“难亡之理”；其二认为中国有“不可亡之机”。在第一个判断中，中国人运用天演论优胜劣败的理论，把自己视为“最优最宜之黄种”，而这优等之民族，“诚加以人治，助其宜而保其优，固将竞争而常胜，又孰得而亡之，故曰中国有难亡之理者此也。”^②至于西人诋我华种之劣，实属“妒忌之言”，为“至谬而大诬者也”。在第二个判断中，时人认为中国尚有等待开启的民气存在，这珍贵之民气将给中国带来“不可亡之机”：

“夫国者，民之积也。民气既昌，国罔不强，民气既靡，国罔不弱，我四万万人能推此民气而用之，人人以王室式微为痛愤，人人以国体屈辱为纪念，人人以国势微弱为愧耻，则必可易危为安，易弱为强。谚曰，一人致死，万夫莫当。况合四万万人以致死，其国安可得而亡哉。故曰中国有不可亡之机者此也。”^③

上述两个判断的分量不在于它是否科学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了现实，而在于它刺激了中国人的心灵，增进了中国人的自信。在那个国势垂危的时期，国人的自信心显得分外重要，它是国运能起死回生的必备心态。

① 《论自强图存》，《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

②③ 佩弦生：《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清议报》第38册，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二月十一日。

当然，仅仅靠某些人精神上的自信心还不足以挽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要救亡图存，还要寻找一条救国的路径。这条路径是什么，人们思索着，探求着，仅在清末10多年间，便提出了一个个救国的方案来，其中有变法维新的改良救国论；有推翻王朝的革命救国论；有发展经济的实业救国论。此外还有内容各异的文化救国主张，包括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以及习俗救国、文学救国、小说救国、音乐救国等。这些救国主张反映了先识者思考问题的不同立场和不同出发点，它无意中启示人们，救国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综合指标，既不能仅仅抓住一方面而不顾其它，同时也不能忽略较为具体的诸多领域。尤其引人注目的文化救国论，它的具体主张虽有不同，但这些主张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来改造国人的素质，形成国民的近代品格，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无论是教育救国、习俗救国、文学救国、音乐救国，都不过是要通过教育、习俗、文学、音乐等手段来开蒙国人，改造国人的文化品性，从而完成人的近代文化性格。可以想见，一个没有近代文化性格的国人群体，在世界的近代化过程中，能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总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清末有识之士，把救国的思考点从客体转向主体，从注视外在的物化形式转向透视内在的国人灵魂，这不仅是寻求救国过程中思维方式的一大突破，也是寻到了要真正救国所不可缺少的一条重要途径。一个国家的自存、自立、自强，说到底还是国人群体合力共创的结果，群体合力所孕育的能量是巨大的。清末有识之士不得不从国民与救国关系的新角度进行严肃而又深刻的思考。他们思考的重点主要是从国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塑造国民与救国这两个层面进行的。

他们首先把国民与国家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看成是形影相随的关系。“国家者，聚无数人民而成立者也。”^①“国之有民，

^① 《论国民不可无政治思想》，《东方杂志》第3卷第4期。

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①“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有丝毫不容假借者。”^②用身体各部分及形影作比喻，强调的是国民与国家关系的极度密切，它直接涉及到“国家之盛衰强弱，必视国民之爱力以为衡，”^③“国之盛衰强弱，常视人民之动作为衡”^④这样一个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大问题。清末知识分子如此这般地认识问题，不仅是对“治国者”的一个警告，更是为了强调在当时的中国“以民气立国”要比“以兵立国”、“以财立国”、“以土地立国”显得更为重要：

“善治国者，知开民智而授民权，使民发其自然之天性以爱国，而国亦可以受其益。是故善治国者，知民智开民权立，政府一二人之耳目有未逮也，而民之耳目多于政府者无数，不逮者可因之而逮。政府一二人之精力有不足也，而民之精力充于政府者无数，不足者可因之而足。是故政府者，人民之先导，而人民者，乃政府之后援。是故善治国者，知政府与人民之有相依赖也，故勿欺人民，勿负人民，勿秘人民，勿抑人民，勿强人民，勿妒人民。人民有所过，则较正之，人民无所过，则顺从之；人民所未知者，则引导之，人民所已知者，则扩张之，若是者，谓之养民气，民气强者，国家强也。是故国家之不可侮，非国家之不可侮也，民气不可侮；国家之不可灭，非国家之不可灭也，民气不可灭。以兵立国者，兵穷而国尽；以财立国者，财穷而国尽；以土地立国者，土地穷而国尽；若以民气立，则民有一日未尽殀，而国固一日

① 梁启超：《新民说·第一节·叙论》，《饮冰室专集之四》。

② 梁启超：《新民说·第四节》。

③ 《论国民不可无政治思想》，《东方杂志》第3卷第4期。

④ 《论今日国民之动作》，《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

不能尽也。是以君子贵民气。”^①

既然国民与国家关系甚密，那么优劣不同的国民对国家影响自然不同。“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度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如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②若国民的素质低劣，情况恰恰相反，“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③“敝履不足以任长途，疲马不足以驰千里，雕零之民，不足与图立国之本……”，^④“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⑤所以结论是：“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⑥而当时的中国，于国民身上反映出的问题，实为严重，其时愚弱怯陋之民给中国时政带来了多方危难：

“中国时局至今已危险万分，势不得不急筹挽救之法。然挽救之主力，止有两端：一在政府，一在国民。今政府既无可望矣，而观于国民，则其无可望之情，实更甚于政府。何以言之，盖政府所以愿革故鼎新以为挽救之计者，正以大局之安危与彼之富贵利达无密切之关系耳。若国民则身家所在，必大局安而后身家安，若大局危则身家亦必危。就国民言之，宜如何急图改革以为保存之计。乃非惟不愿改革，亦且并无改革之思想，其可危者一也。又今之政府无不窟穴于积弊之中，苟一经改革，则于彼实有大损，宜其有所不愿。若就国民言之，则惟有尽力改革，而后可以去今日之危险，图他日之安全。乃今之民情全不知此，方以沿习积弊为当然，改行新政为可惜，如此则何望于保存，其可危者二也。又今之政

① 《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

②③⑤ 梁启超：《新民说·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④ 《养民气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3期。

⑥ 梁启超：《新民说·第一节·叙论》。

府虽不甚愿改革，然犹时举行一二新政以为敷衍之计，则虽有不愿改革之意，而犹如其当改革也。而今之民情，则于有利无害之事亦并不愿其举行，甚且于此事之为利为害并无所知，而专好听旁人之怂恿以与新政为难，则于保存之道去之更远，其可危者三也。”^①

无改革思想，且憎恶改革，进而与改革为难，一国之国民如此，国家前途无望矣。这就引发了清末有识之士的进一步思考，即重新塑造国民对救国的重要意义。“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②“盖国者，国民之身体也，国民者，国之性命也。国之于国民如鱼之于水，人之于空气然，鱼无水，鱼立僵，人无空气，人立戕，国无国民，国立亡，其道一也。”^③“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④甚或直言：“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⑤因此塑造新国民实为当时中国之大计，“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⑥“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此其功虽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宁复可蹉跎蹉跎，更阅数年，将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复得者，呜呼，我国

① 《论中国改革之难》，《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

② 梁启超：《新民说·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③ 万声扬：《中国当重国民教育》，《湖北学生界》第2期。

④ 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

⑤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

⑥ 梁启超：《新民说·第一节·叙论》。

民可不悚耶，可不勦耶，”^①“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跼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民之不可少也如是。”^②

欲塑造新国民是近代知识分子在步履救国的征途中设计的多种救国方案之一；是中國人在设计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维新变法”等方案后，因遭到“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再度深入探索的新思路。它与以往救国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注重和强调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物化形态转向注重和强调精神文化的观念形态。它是在原有探索基础上的一次升华，是合乎中国近代国情与民情的逻辑深化。它引导国人从仅仅依赖先进的器物 and 制度从而转向重视国人心灵的自觉。观念形态是人的行为方式的动力之源，被动的行动与自觉的行动所释放的能量相差悬殊。作为个体的人如此，作为群体的人更如此。一个群体若个人自身均具备相同观念的作用下，产生的行动合力是不可估量的，它的确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塑造新国民来救国具有可操作的实践价值。清末有识之士认识了这一点，其所谓“一人致死，万夫莫当。况合四万万人以致死，其国安可得而亡哉”，^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认识。清末知识分子尤其注重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的统一性，认为两者间彼生此生，彼消此消，并非龃龉矛盾。未开蒙者，因认识不到个体与国家利益的相关性，故为利而不顾公利，为私利甚或损公利。而事实是：自私未必利私，奉公未必损己。清末知识分子希望国人对此有所领悟，知晓“若国民则身家

① 梁启超：《新民说·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② 《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

③ 佩弦生：《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清议报》第38册。